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 修身教育及其影響*

蔡錦堂**

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本統治臺灣時期，臺灣的公學校修身教育以及其對臺灣人學童所造成的影響。由於日治時期的公學校修身教科書，到目前仍無法完整收集齊全，特別是戰爭後期1942年起發行的教科書，因此本論文不以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為主，而擬藉既有的研究成果，再配合對接受過日本統治時期公學校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進行問卷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來試圖分析瞭解修身教育的情形與影響。

問卷調查部分，係於 203份有效問卷調查中，針對修身等科目的喜好程度、對生活知識影響最大的學科、對日本國歌與教育勅語的記憶情形、對修身教科書人物的記憶程度、尚記得哪些修身教科書內的人物等項目的回答結果，進行整理分析。最後則以對接受過日本教育的老一輩一般臺灣庶民，進行口述訪談之後的回應，配合前述之問卷調查，再加以分析探討。

關鍵詞：公學校、修身、教科書、修身教育、教育勅語、問卷調查、口述訪談。

* 本論文為「近代東亞教育史與日本殖民教育——日治時期臺灣、韓國學前與初等教育教科書及其教學」研究計畫成果之一部分，曾於2005年4月舉行的「日治時期初等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一、前言

本論文旨在探討日本治臺時期，臺灣的公學校修身教育以及其對臺灣人學童所造成的影響，重點置於後者，亦即公學校修身教育對臺灣人學童所帶來的影響。

有關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一定要論及修身科目的制度、授課時數、以及修身教科書內容等，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分析尤其重要，但是關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已有多位學者提出著作，諸如：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歐用生〈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公学校教科書の研究——修身科教科書を中心として〉，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而筆者亦曾提出〈日本統治初期台湾公学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一文。¹這些著作或論文，或許由於無法完整的收集各時期全部的修身教科書，因此無法呈顯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的全貌。²筆者撰寫本篇論文，雖亦嘗試收齊所有各期修身教科書，但仍無法畢其功，特別是戰爭

1 E. Patricia Tsurumi,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歐用生,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湾公学校教科書の研究——修身科教科書を中心として〉, 《アジア文化》第6・7号, 1981・1982; 許佩賢,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1994); 周婉窈, 〈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 收於《臺灣史研究》8:2 (2001年12月), 該篇論文亦收於周婉窈,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 允晨文化公司, 2003年); 蔡錦堂, 〈日本統治初期台湾公学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 收於大濱徹也編, 《近代日本の歴史的位相——国家・民族・文化》(東京: 刀水書房, 1999年), 頁299-311。

2 如Tsurumi的著作中有論及修身教科書, 但僅挑部分教科書內容作分析; 周婉窈論文中以1928年起發行的教科書(周論文中所謂的第2期修身教科書)為主要分析對象; 許佩賢亦以1928年起發行的教科書(許稱之為府定第3期)為主, 但亦廣及於1941年、甚至1942年發行(許稱之為府定第5期)的部分教科書; 而筆者的論文亦僅以1914年起出版的初期教科書為分析對象。

後期1942年起發行的修身教科書，六卷中仍欠缺三卷，³因此也無法突破現有研究的成果。以此之故，本論文不以修身教科書的內容分析為主，而擬藉既有的研究成果，再配合對接受過日本統治時期公學校教育（或國民學校、甚或小學校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進行問卷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來試圖分析瞭解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教育的情形與影響。但爲了分析方便起見，在論文寫作方面，於下一節將先綜合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簡單闡述公學校修身教育、特別是修身教科書內容的大概輪廓，接著再就問卷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的結果作一分析。

二、公學校修身教育與修身教科書

（一）修身教育主旨與修身教科書

1898年（明治31）年臺灣公學校成立時，「公學校規則」第一章主旨的第一條明記著：「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授予實學，養成國民性格的同時並使精通國語爲主旨」，⁴之後「公學校規則」雖經多次改訂，但基本上施予德育的「國民性格涵養」、授予實學的「生活普通知識技能」、以及熟習國語（日本語）一直都是公學校教育的目的，其中有關施予德育、涵養國民性格方面，最主要的科目即是「修身」科。公學校修身科自始即仿日本本國置於所有教科科目之首，雖然其授課時數一週只有一至二小時。初期的修身教育，由於日本國內乃自1900年（明治33年）4月起始以國費著手編纂國定修身教科書，而於1904年發行使用，因此臺灣亦遲至1913年（大正2年）始由總督府編纂完成、隔年出版發行修身教科書，在空窗期間則以國語教科書代替，以及漢譯《教育勅諭述義》、《臺灣適

3 1942年起發行的最後一期修身教科書，筆者至目前只能看到當時已稱為國民學校的一、二年級所使用的《ヨイコドモ》上（兒童用）、與下（教師用），以及四年級使用的《初等科修身 二》。據聞日本玉川大學收藏有完整的全套修身教科書。

4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年（青史社，複刻本，1982年），頁229。

用作法教科書》等作為參考資料。

眾所周知，「修身」一詞始自中國古籍《大學》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語，意即欲平治天下，首從修習自身品德做起，其次講求家庭和睦，接著治理國家，最後才能談及平定天下。在中國教育中，大清王朝末年，1902年（光緒28年）也開始仿日本於欽定學堂章程中排入「修身」科的科目名稱。⁵在臺灣，1898年總督府於「臺灣公學校規則」中，明定修身科主要教授內容有四大項，即：「人道實踐的方法、日常的禮儀作法、教育勅語的大意、本島人民應遵守之重要諸制度的大要」。⁶1904年修身科的目的，因應「公學校規則」的改訂而定為「基於教育勅語的旨趣，以涵養兒童的德性並指導道德之實踐」，⁷自此修身教育大致沿此主旨進行。

1914年臺灣總督府仿日本國內之國定修身書編纂的修身教科書開始發行後，至1945年日本結束臺灣統治為止，共編纂發行了三期以漢人學童為對象的修身教科書：⁸

第一期：1914~1927《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卷一至卷六

5 藍順德，《公民教育的內涵》，復文出版社，1986年，頁46。

6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1939年（青史社，複刻本，1982年），頁231。

7 同前註，頁263。

8 其實在這三期的修身教科書之外，總督府另於1941年出版了《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卷一至卷二，但因公學校與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之故，隔年的1942年起即改為發行《ヨイコドモ》上下卷與《初等科修身》卷一至卷四，1941年版的《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卷三至卷六部分則停止編纂發行。許佩賢在前述其碩士論文中，將1910年出版的《公學校修身科教授資料》三卷，以及1941年的《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種》卷一至卷二，亦各算為一期，即成為前後五期，但周婉窈在其前述論文中，並不採此種定期法，而只定為三期。本文為方便敘述起見，採用周婉窈的「三期」修身教科書的寫法。而「兒童用」教科書之外，亦另編纂有「教師用」修身教科書，如同現今之教師手冊，作為教師教學引導與教法設計之用。另外，又有以原住民兒童為對象的《公學校修身書 第二種》卷一至卷六，1930年起發行，供「蕃人公學校」使用。參見前述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頁52-5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06。

第二期：1928~1941《公學校修身書》（兒童用）卷一至卷六

第三期：1942~1945《ヨイコドモ》上、下

《初等科修身》卷一至卷四

（二）四大綱領與其他德目

根據1913年總督府所發行的《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第一篇）以及1919年《公學校修身書卷五卷六編纂趣意書》，第一期修身教科書即依前述「臺灣公學校規則」（第十八條）中所載「基於教育勅語的旨趣，以涵養兒童的德性並指導道德之實踐」之主旨進行選取編纂適切的教材，並訂出「公學校修身教授四大綱領」，亦即：「國民精神涵養、從順、誠實、勤勞」等德行項目。⁹此四大綱領中的「誠實」與「勤勞」，乃個人須具備的德行，「從順」是在社會群體中被要求者，而「國民精神涵養」則是國家所要強調的倫理，公學校修身教育中所要求的「國民性格」，指的應該就是這四項德行。如再根據第二期修身教科書編纂時所印行的《公學校修身書修正趣意書》，第二期的修身書裡亦維持原來第一期的四大綱領不作變動。¹⁰目前因未能看到第三期修身書之編纂趣意書，無從得知第三期是否仍沿用第一、二期以「國民精神涵養、從順、誠實、勤勞」為四大德目，但至少至1942年為止，臺灣的公學校修身教科書均是以此四項德目為修身教育的最主要內容，是無庸置疑的。

而此四大綱領（或德目）衍伸出來的課文或其他德目，如以第一期修身教科書內容觀察，則與「國民精神涵養」有關的課文（標題）有：「天皇陛下」「皇后陛下」「明治天皇」「臺灣神社」「我國皇室」「能久親王」「報恩」「國旗」「教育勅語」「祭日祝日」「昭憲皇太后」等等；

9 臺灣總督府，《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第一篇），臺灣總督府，1914年，頁3-5；臺灣總督府，《公學校修身書卷五卷六編纂趣意書》，臺灣總督府，1919年，頁2-3。

10 參照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頁57-58。

與「從順」有關的有「遵守吩咐」「遵守規則」「不要任性」「重視法規」「保持乾淨」「要學習國語」「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耐性」「公共心」「敬師」等等；與「誠實」有關的有：「不要說謊」「不要隱瞞過錯」「遵守約束」「正直」「知恥」「至誠」「規律」「廉潔」「德行」「誠」等等；與「勤勞」有關的有：「好好勞動」「勤勞」「廢物利用」「錯誤的學問」「勤儉」「公益」「公眾衛生」等等；另外亦強調注重清潔、去迷信、啓發衛生思想、誠利己忘恩、獎勵公益等。卷一至卷三最後一課均以「好兒童」（ヨイコドモ）作結束，卷四最後一課為「好國民」（よい国民），卷五為「誠」（所謂眾善諸德的源泉），卷六則為「一德」（歸結於教育勅語中之聖訓）。¹¹第二期公學校修身教科書的課文內容與相關德目，雖有所變動，但大致亦不脫離第一期的四大德目主軸，詳細可參閱前述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一文。

（三）關於「教育語」

這裡須要特別闡述的是所謂的「教育勅語」。前述「臺灣公學校規則」主旨定為「基於教育勅語的旨趣，以涵養兒童的德性並指導道德之實踐」，第一期修身教科書最後一卷（卷六）的最後一課亦以教育勅語中之聖訓「一德」作為公學校六年修身教育的總結。其實，第一期修身教科書卷四的第十課課文題目即是「教育勅語」，該卷課本日次之後並登載了跨頁的「教育勅語」全文（旁附訓讀讀法），而卷六全卷課文幾乎均與教育勅語之本文有關，以教育勅語中的語句定出卷六各課之文脈，最後幾課則對教育勅語內容分別作出解釋。¹²第二期修身教科書亦如是，卷四第二十四

11 參照前引《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第一篇），頁3-6，以及《公學校修身書卷五卷六編纂趣意書》，頁2-4。

12 前註《公學校修身書卷五卷六編纂趣意書》，頁1-7。

課課名為「教育勅語」，卷六之最後四課（22～25課）課名亦均為「教育勅語」，逐課對教育勅語之內容分段作解釋說明。¹³

何謂「教育勅語」？「教育勅語」全名為「教育に関する勅語」，意即「有關教育的勅語（天皇的聖訓）」，它是由日本明治初期的兩大儒學者——井上毅（1843~95）與元田永孚（1818~91）秉持明治政府最高實力者伊藤博文之意所起草，以儒教的家族主義為基礎，強調教育的基本為「忠君愛國」、「忠孝一致」，於1890年（明治23年）10月30日由明治天皇頒布，成為明治新政府國家主義式的最高教育理念。其如同戰前日本近代天皇制國家下的其他詔勅般，為了顯示天皇的權威，以獨特的文體夾雜著極難解的漢語，與一般國民的日常用語有相當的距離，但也因此更凸顯其威嚴神聖之感。（圖一）為教育勅語之全文圖版，而其「漢譯」版本如下：¹⁴

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彰顯爾祖先之遺風矣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御 名 御 璽

¹³ 參閱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67-369。

¹⁴ 片山清一編，《資料・教育勅語——澳發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東京：高陵社書店），1974年，頁6。據此資料，當時除漢文版譯文外，日本文部省另出版有英文、法文、德文教育勅語譯本。



圖一：教育勅語

從教育勅語的內容來看，它採擷了中國儒教「五倫」以及其他德行：「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但也強調「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忠君愛國」理念。¹⁵

教育勅語發布之後，下賜到各級學校，並透過祝祭日儀典中的「奉讀」儀式，以及納入修身教科書中，成為修身科最根本的依據，要求學童

15 作為日本永遠遵循的教育規範之教育勅語發布前後，並非完全沒有爭議。發布之前即有儒教主義、佛教主義、國體主義、歐洲倫理主義之爭論；發布之後，於1895年左右，亦有當時為文部大臣的西園寺公望以適應新時代的道德，亦即新社會的新道德非上下式的道德，應是所有人民均具平等關係，自他相互尊敬的道理，質疑教育勅語的忠孝道德是否適合當時的世界文明，並傳出有文部省次官企求撤回教育勅語之說。對此不穩言動，明治天皇亦曾詢問伊藤博文之意見，但伊藤斷然奉答天皇聖勅之變更、追加或撤回均不可。參見片山清一編，《資料・教育勅語——澳癸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頁239-243。

暗誦並身體力行。

1945年8月15日二次大戰結束後，隔年1月1日昭和天皇發表所謂「人間宣言」的詔書，親自否定自己的「現人神」神格；同年11月3日戰後的「日本國憲法」公布，「天皇」成為「日本國的象徵」，不再如原先一般「神聖不可侵犯」。至於戰前日本教育的最高理念「教育勅語」，由於美國曾在二戰中吃盡日本「忠君愛國」的苦頭（如神風特攻隊等），乃於戰後強烈施壓，¹⁶1948年6月新憲法施行下的日本第二回國會，眾議院決議「排除」教育勅語，參議院亦通過「失効確認」之後，指示文部省廢止教育勅語，¹⁷教育勅語從此由日本教育場域中消失。

但是，戰前受過日式初等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教育勅語究竟對他們烙下了什麼樣的印痕、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呢？下一節將藉問卷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作初步的解析。

(四)修身教科書中出現的人物

由於臺灣的修身教科書大致仿日本國內的國定修身書，因此亦採人物基本主義與德目基本主義綜合運用。以課名來看，似是依照德目基本主義編纂，但課文內容其實頗多人物基本主義色彩。例如第一期修身教科書卷四第十一課，課名為「忠實」，內容是藉實在的人物——二宮先生（二宮尊德），來敘說「忠實」此一德行的重要性。修身教科書中對於「德目」的敘說，多採「例話」方式（另有訓辭及格言等）進行，「例話」（舉例說明德目內容）則又可分「作話」（配合德目創作出來的人物、內容）以及「寓話・童話」、「實話」（實在人物的材料、內容）等。其中，「實

¹⁶ 戰後「美國教育使節團」到日本，對戰後日本的教育提出改革意見，認為儀式中奉讀教育勅語，以及對天皇皇后的「御真影」敬禮的習慣，乃屬對學生思想感情強力統制的方式，造成日本好戰的國家主義，認為如此慣習不適合學童人格的養成，違反戰後民主主義式日本的學校教育，非停止不可。同前註，頁268-269。

¹⁷ 同前註，頁278-284。

話」中的人物材料，除了少數採自臺灣人物，幾乎全部取材自日本歷史上的人物。反觀日本國定修身書的「例話」，則多所採用外國人物¹⁸作為素材，二者間是有些差距。

修身教科書中出現提供學童作為學習楷模的人物，第一期有：神武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能久親王、天照大神、昭憲皇后、瓜生岩子、三宅尚齋夫人、二宮尊德（金次郎）、塩原多助、貝原益軒、林信篤、名和長年、吳鳳、伊能忠敬、熊澤蕃山、中江藤樹、瀧鶴臺夫人、佐久間大尉、垂仁天皇、仁德天皇、醍醐天皇、毛利元就、ナイチンゲール（南丁格爾）、中村正直、曹謹、磯崎眠龜、井上でん、乃木大將等。¹⁹這些人物中，吳鳳與曹謹為眾所周知的臺灣歷史人物，而ナイチンゲール為西方女性典範之一。

第二期則有：楠木正成、楠木正行、渡邊崋山、塩原多助、貝原益軒、平田篤胤、瀧鶴臺夫人、二宮尊德、荻生徂徠、伊藤仁齋、青木昆陽、德川光圀、伊能忠敬、中江藤樹、長田德本、伊藤東涯、高田善右衛門、伊藤小左衛門、林子平、廣瀨武夫、瓜生岩子、乃木靜子、杉浦重剛、金原明善、石井十次、村上專精、佐久間勉、山口用助、高峰讓吉、乃木希典、井内貞行、吳鳳、曹謹等。²⁰

關於第三期修身教科書中出現的人物，由於資料不齊全無法列出。但值得一提的是，出身於臺灣的人物，在第一、二期中有吳鳳（雖然其行徑敘事有甚多虛構）、曹謹二人被採擇，但第三期，也就是戰爭末期、1942年始編纂出版的修身書中，另外又出現臺灣出身的人物。

根據蒐藏有大量殖民地教科書的日本東京玉川大學教育博物館的白柳弘幸，於其所撰〈臺南・安平墓地の墓誌と公学校修身書教材〉中披露，

18 《臺灣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第一篇），頁6-8。

19 參見筆者，〈日本統治初期台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頁308，以及《公學校修身書卷五卷六編纂趣意書》，頁4-5。

20 參見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31-332。

第三期修身教科書《初等科修身一》（昭和18年3月第1版發行，使用對象為國民學校三年級學童），第十五課「心を一つに」（一心），課文內容全文翻譯如下：

大東亞戰爭開始之後，許多士兵為了國家勇敢赴戰場。

其他的人也沈不住氣了，紛紛提出要求：「請帶我到戰地去！」「我也要！」「我也要！」

這些人有的成為軍夫，有的充當翻譯，前往戰地。有一些女性成為護士，也上了戰場。為了國家，大家都勇敢赴戰場。

某地有父子二人，都成為軍夫前往戰場。父親在戰地病死，臨終前叫來兒子，告訴他：

「因為生病而死，實在對不起國家。我死後，你要加倍認真做雙人份工作，盡力報國」。兒子於是遵從父親的話，非常努力工作。

留在國內的人們，也都為了國家認真盡力。我們要加油，別讓身處戰地的士兵們有後顧之憂。

雖然課文中的「某地」並未註明何處，「軍夫父子二人」也沒有寫明實際身份，但根據白柳的調查，確信「某地」應是臺南安平，「軍夫父子二人」應是目前葬在臺南市安平第一公墓12座臺籍日本軍人墓之一的「陳養」以及其兒子「陳阿雲」。²¹戰爭末期公學校修身教科書，將臺灣人軍夫為日本國出征病死的事蹟列為課文內容，是相當奇特但也可以理解的。同時期1943年出版的國民學校國語教科書《初等科國語》卷三的「君が代少

21 參見白柳弘幸，〈臺南・安平基地の墓誌と公学校修身書教材〉，收於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会運營委員會，《殖民地教育の殘痕——殖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6号》（東京：皓星社，2004年），頁118-123。臺南安平陳養之墓碑銘為「故陸軍軍屬陳養之墓」，應為死後從軍夫昇為軍屬。另，根據白柳論文，日本內地與朝鮮當時的修身教科書，亦有課名同為「心を一つに」一課，但內容則為防衛「元寇」（元朝）來襲、同心護衛國土，只有臺灣是以軍夫父子一心報國為題材。

年」（君之代少年、或譯為國歌少年），以及《初等科國語》卷五的「サヨンの鐘」（莎勇之鐘），亦以臺灣人（國歌少年詹德坤及原住民少女莎勇）的愛國典範事蹟納入教科書。²²不過，或許是軍夫陳養父子的出身地以及人名並沒有被登載在修身書裡，因此到白柳發表論文為止，似乎尚不會受到學界等的注意，這個事蹟及其相關影響值得繼續追蹤研究。

以上為修身教育，特別是修身教科書的大致情形。筆者曾經以接受過日式教育的七、八十歲以上的老一輩臺灣人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以及口述歷史訪談。下一節將根據問卷調查與口述歷史訪談的結果，針對日治時期公學校修身教育所帶來的影響，作初步的解析。

三、修身教育的影響

戰前曾經擔任過總督府殖產局農務課事務官，也曾擔任臺灣人少數幾位郡守之一的宜蘭郡守，而戰後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際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的楊基銓，²³在他的著作《台湾に生を享けて》中，曾有如下的敘述（原文為日文）：²⁴

就我的體驗來說，公學校時代所學的科目中，最有用的就是修身的課程。這是一門教你思考如何成為有用的人、卓越的國民，以及如何成為遊走天下、挺胸邁步、傑出的世界公民的特殊學科。透過故事，教導你「不要欺騙人、不要說謊」「說謊者，最後將失去眾人的信賴，結果禍及己身」，或者「不要成為利己主義的人」

22 「君之代少年」以及「莎勇之鐘」相關內容，參閱周婉窈，〈日治末期「國歌少年」的統治神話及其時代背景〉及〈「莎勇之鐘」的故事及其周邊波瀾〉，收於《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1-32。

23 楊基銓，臺中清水人，1918年生，1940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商業學科，曾任宜蘭郡守，戰後歷任臺北市政府秘書、農林廳水產科長、經濟部常務次長、臺灣土地銀行、華南銀行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國際文化基金會董事長等。

24 轉載自河添惠子，《臺灣新潮流》（東京：雙風社，2004年），頁148-149。

「不要與只顧自己而不顧友人生死的卑怯者交朋友」。這些教誨日後深深地影響了我的處世態度。

修身課是利用寓言或故事，教育小孩們使其容易瞭解為人處世之道。這個科目，到底使遭遇困境的人得到多少幫助、克服多少考驗呢？又，因為這個科目的緣故，有多少的人從迷惑中再度抱持希望站起來、甚至成為有益於社會之人呢？真的是無法估量。我認為修身課實在是不計其數的人的指標，使他們事業成功，也造就了許多在歷史上留名的人物。我到現在仍然認為公學校的修身課，是促使日本教育成功的主要因素。我也深信，日本治臺五十年間當局的施政之中，讓臺灣人獲益最多的，就是教育的成功。

楊基銓認為日治時代公學校教育中，最受用的就是修身科，修身教育影響了他後來一生的為人處世態度，修身科是促使日本教育成功的最主要因素，臺灣人也從修身教育中獲得了莫大的利益。但是，這樣的看法，終究只是身為高級知識份子、官僚的楊基銓自己的個人認知？其他一般接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對修身教育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一)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筆者於去年與臺灣師範大學吳文星、楊思偉兩位教授一起進行一項日治時期公學校教育的研究計畫。首先來看有關問卷調查部分。在203份有效問卷調查結果中，²⁵針對公學校教育中「國語」「修身」「國史」「地理」

25 問卷調查於2004年7月至2005年2月間進行，接受調查者共203人，其中男性101人，女性94人（另8人未註明性別）。年齡最長者出生於1915年，最年輕者出生於1935年，大正年間出生者44人，昭和時期151人。受訪者小學教育之地區別，涵蓋臺灣全島，77位於臺北州、17位於新竹州、41位於臺中州、42位於臺南州、15位於高雄州（含澎湖）、4位於花東二廳（另7位未填答）。最高學歷別：小學64位、中學69位、高中51位、大學17位、大學以上2位。問卷分中、日文版兩種。問卷調查結果分析，於2005年3月14日由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陳盛賢負責作出。

四個科目所作喜歡與否的程度問答，在「1.非常喜歡 2.有點喜歡 3.普通 4.不喜歡 5.非常不喜歡」五選項中，對「修身」科目選擇「非常喜歡」者有131人（佔65.83%），選擇「有點喜歡」者39人（19.60%），二者合計高達85.43%，高於「國語」科目的80.40%（非常喜歡58.79%，有點喜歡21.61%）、「國史」科目的75.38%、「地理」科目的69.34%。而對「修身」科選擇「不喜歡」者僅有9人（4.52%），選擇「非常不喜歡」者0人（203人中有1位未填答）（如表一）。由這一題問答，約略可知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最愛的是「修身」科目。

表一：對小學教育國語與社會學科的喜好程度表

問 題	選 項					合計	未填答
	非常 喜歡	有點 喜歡	普通	不 喜歡	非常 不喜歡		
1. 對小學教育中的 「國語」科目	117	43	33	6	0	199	4
	58.79%	21.61%	16.58%	3.02%	0%	100%	
2. 對小學教育中的 「修身」科目	131	39	23	9	0	202	1
	65.83%	19.60%	11.56%	4.52%	0%	100%	
3. 對小學教育中的 「國史」（日本 歷史）科目	80	70	42	9	0	201	2
	40.20%	35.18%	21.11%	4.52%	0%	100%	
4. 對小學教育中的 「地理」科目	89	49	50	10	0	198	5
	44.72%	24.62%	25.13%	5.03%	0%	100%	

N（受訪者）=203

在「小學教育的各科教科書中，對您的生活知識最有影響力的是 1.國語 2.修身 3.國史 4.地理 5.其他」的選項中，選擇「修身」者有

131人，佔填答人數198人（203人中有5位未填答）的65.83%，得票最高；選擇「國語」的有44人（22.11%），「國史」8人（4.02%），「地理」7人（3.52%），其他8人（如表二）。從這一題中可知，「修身」科最被認為對生活知識具有影響力。

表二：對生活知識影響最大的學科

選 項	人 數	百分比
1. 國語	44	22.11%
2. 修身	131	65.83%
3. 國史	8	4.02%
4. 地理	7	3.52%
5. 其他	8	4.02%
合計	198	100%

N（受訪者）=203 未填答=5

在對日本國歌「君が代」的記憶情形所作問答中，202位答題者（203人中有1位未填答）中，回答「非常記得」者有145人（佔72.86%），「大致記得」37人（佔18.59%），二者合計91.45%，亦即有高達91.45%的受訪者表示可以記誦日本國歌「君が代」。

在對「教育勅語」的記憶情形所作問答中，同樣202位答題者中，表示「非常記得」者40人（20.10%），「大致記得」者98人（49.25%），二者合計69.35%；而選擇「普通」者22人（11.06%），「不太記得」者38人（19.10%），「完全不記得」者4人（2.01%）（如表三）。在戰後已經60年的今天，仍有將近7成的受訪者表示能夠記誦用詞生澀的「教育勅語」，實在值得我們訝異。

表三：對日本國歌與教育勅語的記憶情形

問 題	選 項					合計	未填答
	非常 記得	大致 記得	普通	不太 記得	完全 不記得		
1. 對「君が代」的 記憶情形	145	37	11	9	0	202	1
	72.86%	18.59%	5.53%	4.52%	0.00%	100%	
2. 對「教育勅語」 的記憶情形	40	98	22	38	4	202	1
	20.10%	49.25%	11.06%	19.10%	2.01%	100%	

N（受訪者）=203

問卷中亦有針對「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作複選式的問答。上一節所提及「修身」教科書中人物，即有數十人之多，且各期修身書中人物雖部分重複，但亦有多位相異。設計問卷時為顧及受訪者年齡多已七、八十歲以上，因此只選擇8位人物，題目定為：

「您如果還記得以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請在□內打✓（可複選）」
所列選項為：

- 「1. 二宮尊德 2. 塩原多助 3. 瓜生岩子 4. 貝原益軒 5. 昭憲皇太后
6. 渡邊華山 7. 伊能忠敬 8. 曹謹」

這8位除了渡邊華山僅出現於第二期修身書外，其餘均同時出現在第一期與第二期修身教科書中；當中包括2位女性（瓜生岩子與昭憲皇太后）、1位臺灣人物（曹謹）。

問卷調查的結果，對於上述修身教科書8位人物記憶程度如下2表：

表四：對於「修身」教科書人物的記憶程度表

選 項	人數	百分比
1. 記得8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全記得）	0	0.00%
2. 記得7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1	0.49%
3. 記得6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6	2.96%
4. 記得5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11	5.42%
5. 記得4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12	5.91%
6. 記得3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31	15.27%
7. 記得2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38	18.72%
8. 記得1個「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76	37.44%
9. 都不記得「修身」教科書中的人物	28	13.79%
合計	203	100%

平均記憶為1.98個人物，37.44% 受訪者記得1個人物，為最普遍情形

表五：對於「修身」教科書人物的記憶情形表

選 項	人 數	百分比
1. 二宮尊德	149	73.40%
2. 塩原多助	17	8.37%
3. 瓜生岩子	1	0.49%
4. 貝原益軒	84	41.38%
5. 昭憲皇太后	85	41.87%
6. 渡邊華山	25	12.32%
7. 伊能忠敬	26	12.81%
8. 曹謹	4	1.97%

註：此處的百分比乃是記得的人數相對於全部203位受訪者的比例。

從表五「對於修身教科書人物的記憶情形表」可知，在被提出作為選項的8位人物中，記憶最為深刻的人物前三名分別是：「二宮尊德」（73.40%）、「昭憲皇太后」（41.87%）、「貝原益軒」（41.38%）。二宮尊德（1787~1856）為江戶幕府末期的農政學家，又名金次郎，曾復興沒落的家世，並替小田原藩重振荒廢的領地，之後以其豐富的農業知識與獨特的政治力，致力於諸藩與村落的再興。第一期公學校修身書中即有五課以二宮尊德為主要人物，作為「忠實」「親人」「勤儉」「至誠」「公共心」等德目的典範人物，第二期修身書亦有四課「孝行」「忠實」「勤勉」「至誠」以其為楷模。²⁶戰前臺灣的公學校等教育場所，多仿日本內地建有孩童時代的二宮尊德背負柴薪手捧書本勤勉用功的雕像；另外，日本南北朝時期勤皇愛國的楠木正成作武將裝扮騎戰馬的雕像，也常出現在公學校等校園內，特別在1940年（所謂皇紀2600年）之後更是如此。²⁷排名第二的昭憲皇太后是明治天皇的皇后，而貝原益軒（1630~1714）是江戶時代的儒學者，精於朱子學與陽明學，第一期修身書中有三課（「衛生」「寬仁大度」「謙讓」）、第二期中也有三課（「保持心胸寬廣」「不要自傲」「衛生」）以貝原為典範人物。

關於表四「對於修身教科書人物的記憶程度表」，記得4個以上修身教科書人物的受訪者僅有30位，全部記得者竟然一位也沒有，大致集中於記得1至3個人物，而以只記得1個人物（76位受訪者，佔37.44%）為最多，

26 參閱筆者，〈日本統治初期台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頁308；以及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334或頁364-369。周婉窈論文中談及在其個人所作問卷調查（101份）裡，受訪者印象最深刻的修身科人物是二宮尊德，接著依序是明治天皇、楠木正成、乃木希典、菅原道真。而筆者與吳文星、楊思偉共同進行的問卷調查，是將明治天皇、楠木正成、乃木希典、菅原道真列於「國史」教科書人物中。

27 有關皇紀（或紀元）2600年以後校園內建設二宮尊德或楠木正成銅像的情形，請參閱筆者，〈「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1，頁51-88。

甚至有高達28位受訪者完全沒有圈選（無法判斷是一個都不記得或忘了圈選），整體平均記憶程度僅達1.98個人物。此修身教科書人物記憶程度不高的結果，似乎與表一或表二所呈顯對修身教科書的喜歡，以及認為修身對生活知識最有影響力的問卷結果產生落差，這種矛盾情形到底應該如何詮釋呢？

雖然1914至1927年之間所發行使用的第一期公學校修身書，對於課文中的人物並未完整呈現出其「漢字」全名，例如「二宮尊德」於第一期修身書「卷四」第11至15課是以「二宮先生」之名呈現；「塩原多助」於「卷三」第4、5、6課中是以片假名的「シホバラタスケ」（第4課）以及「タスケ」（第5、6課）出現；瓜生岩子是「瓜生イハ子」（卷三第2課）；貝原益軒是「貝原先生」（卷三第13、14、15課）。對於使用第一期修身教科書的受訪者，或許問卷中完全以「漢字」出現的人名感覺並不清楚，因此多少會影響到表四的修身人物記憶程度調查結果。但是，第二期修身教科書（使用於1928至1941年間）中的人物，原本即以完整的漢字名字呈現（如「二宮尊德」「貝原益軒」「塩原多助」「瓜生岩子」「渡邊華山」「伊能忠敬」等等），與問卷中的名稱是一樣的，因此問卷人名與當時教科書中所學人物名稱一致與否的問題，應不致對問卷結果產生太大的影響。

當然受訪者年齡與記憶的問題亦可用來作為詮釋的理由，不過從用詞生澀難懂的「教育勅語」仍然有近7成的受訪者記得的情形來看，年齡與記憶問題似乎無法完整解釋這個現象。那麼，是否這些受訪者認為修身科對於他們的生活知識有莫大的影響，是在修身科所教授的「德目」方面，而不在扮演媒介或工具角色的例話人物上面，尤其這些人物多是日本近世時期（江戶時代）與近代歷史上的人物，而且數量又不少？

以下筆者再透過對這些七、八十歲受日本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多為一般庶民，而非高級知識份子或眾所周知的著名人物）所作的訪談，來探討修身教育給予這些也常被稱為「日本語族」者的影響究竟如何。

(二)口述訪談情形

前述高級知識份子、官僚的楊基銓提出修身教育帶給他後來的為人處世極深遠的影響，也認為修身科是日治時代日本教育成功的最大因素，使臺灣人獲得莫大的利益。如果這只是屬於社會上層階級的看法，那麼，一般庶民的老一輩臺灣人對修身教育又是如何的感受呢？

我非常喜歡「修身」科，一個星期一次，排在每個星期一的第一節課，內容有許多的「お伽話」和一些歷史上著名人物勤儉、樸實、努力的故事，例如二宮尊德。修身課教我們「礼儀作法」、禮貌、道德，雖然也教我們「忠君愛國」，習字課時也都練習寫「忠君愛國」「武運長久」，因此多少也會受到影響。但是修身課、還有「教育勅語」裡面告訴我們要孝順父母、夫婦和好、兄弟・朋友要互相幫助，「恭儉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ボシ」，這些道德教訓，教導我們應該怎麼做人。當然公學校當時，開始只是為了考試，一定要會背；出了社會，還不覺得有什麼影響，十七歲結婚有了家庭之後，才深深受到影響，對父母、公婆、妯娌都能依照修身課或教育勅語裡面做人的道德、倫理去執行。到目前仍然影響著我的，就是修身課裡面道德倫理的這一部分。中國教育中，就是缺少修身教育的科目，所以社會比較亂糟糟。我認為日本在這一方面很成功。²⁸

這是臺北林黃女士在訪談中有關修身教育的一段話。林黃女士在問卷調查修身書人物中只勾選了二宮尊德與昭憲皇太后，其他的都「記不得了」。

28 臺北・林黃女士（1928年生）訪問稿（筆者2004.9.25訪談）。林黃女士，公學校畢業，家庭主婦。為尊重受訪者隱私，此處暫以「林黃女士」代替受訪者名，底下同。又，訪談時所用語言，有華語、臺語、日語交雜，記錄時原則上用中文表示。

在記得「教育勅語」與否一項，她只勾選「普通」，但是筆者拿教育勅語原文給她看時，竟然能夠相當流利地以日語讀出（部分生澀難懂漢字除外）。她認為修身課排在星期一的第一節課，而且上課好像在聽故事，告訴她們怎樣做人，以及「禮儀作法」「しつけ」（教養、禮貌），到現在她還遵循著這些教誨，受到的影響不可謂不深。不過她認為日本教育教導婦女要服從，對家庭可能比較好，但是她比較欣賞目前的「男女平等」，因為她也受到許多「大男人主義」的苦。

另一位臺南的黃先生則說：

修身第一，修身是做人的基本，其他諸如國語、史地等等都是工具。若是比照法律位階的話，修身可以說是憲法，其他的像法律、命令，都是從憲法演變出來的。修身主要是強調怎麼做人做事，我現在回想起來，那些很多是王陽明學說的理論。日本精神，老實說也是很多自中國優良的方面取得的，修身根本說來也是中國的固有道德。

日本人強調你學問再好也沒用，你做人不好就是不行。因為從小強調這一點，所以對我人生觀影響很大。日本人不希望你TOP或突出，就希望你做個良好的國民，奉公守法，力爭上游，而不是要你遙遙在人家頭上。因此根據我的看法，日本國家的力量不是在政治人物身上，而是在整體國民的力量，他們過去的教育是成功的。

日本教育是除了自己之外，還有想到別人，是注重五倫、道德的教育；而光復後到現在，教育只重視知識，智育教育。很多知識好的人，利用知識謀自己的福利，為了利益可以犧牲別人。所謂「菁英」如果沒有道德觀念，這個社會很可怕，弱肉強食，多數民眾吃虧。戰後是有教育「四維八德」，但是這些是「標語」，是「寫在牆壁上的」。

我女兒是受（戰後）師範教育，她每每開口動不動就跟我說：

「爸爸你受的是日本的奴隸教育。」我聽了簡直要回說：「妳給我出去。」這根本就是違背良心、很惡毒的宣傳。日本教育那是很好的教育，它沒有要我們作賊、做壞事，它也都是要我們做善良的國民。日本教育對我人生影響很大，做人做事的基礎都是那時候所打下來的。尤其我印象最深的是，做人要「正直」「礼儀正しい」（守禮儀）。表裡一致是我們的願望，所努力的也是表裡一致，不像現在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²⁹

黃先生認為他一生正直、守禮儀，這些處世為人的道理，都是當時所打下的基礎，日本教育對他影響很大。他也知道修身教育的主要內涵，是來自中國儒家的學說與固有道德，但是，他提出比較，認為戰後的道德教育如「四維八德」等，是「寫在牆壁上的」。有關戰後道德教育「四維八德」等是「寫在牆壁上的」說法，筆者在之前對淡水一位陳先生作訪談時，也曾聽陳先生說起過。³⁰南北兩位完全無認識交集的受訪者，一字不差的說詞，筆者不禁要懷疑，這種對戰後道德教育的說法或批判，是否已成為這些戰後曾經長期屬於「噤聲世代」的「日本語族」心中共同的認知呢？

黃先生在談到「教育勅語」時，他認為：

戰後一些日本學者談到教育勅語，都會強調說這是軍國主義、天皇制等等，都是要討好西方、潮流，矯枉過正。當時有當時的時

29 臺南·黃先生（1928年生）訪問稿（筆者2005.2.11訪談）。黃先生，高考及格，公務人員退休。

30 淡水·陳先生（1930年生）訪問稿（筆者2004.12.21訪談）。陳先生，臺北工業學校畢業，基督徒。他說：「現在想當時的修身教育，實在是得到很多東西。修身教育真的就是在修身，學到做人的倫理、禮儀、尊敬長輩、對國家盡忠等等。有時在禮堂上閉眼冥想，安靜自己的內心，雖然年紀小有點不知所以然。……後來戰爭結束之後，政府在牆上寫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禮義廉恥等大字，那些只是口號，只是寫在牆壁上的而已。」另外，有關戰後「四維八德」等教育問題的探討，可參考張榕庭，〈戰後臺灣民族精神教育之研究（1951-1996）〉（臺北：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5年1月）。

代背景，用現代眼光去批判當時情況，有時候也不是很好。教育勅語裡也沒有提到要大家去侵略別的國家，是要大家對父母要孝順、兄弟之間和好、朋友互信、博愛眾人、要守法。在朝會時校長也是會宣讀教育勅語。³¹

教育勅語對黃先生而言，他所注意到的並不在於日前一般學者所偏重強調的「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的「忠君愛國」的部分，而在於儒教五倫以及其他博愛、守法的部分。這樣的看法，黃先生並非個例，有許多的受訪者，如前述林黃女士談到教育勅語，雖說「忠君愛國」多少還有印象，但她更重視其他的五倫、道德教訓、做人處世方面的影響。這種與目前一般學者談到教育勅語，僅僅強調軍國主義、天皇制的部分，而對其他儒教或社會道德教育層面視而不見的見解，有很大的落差，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淡水的高先生（1928年生）到現在都還大致記得教育勅語的內容，看著教育勅語的影印稿唸來又快又流暢。「以前是須要背誦的，背好的人先回家。」他對於修身教育的感想是：

修身是「心肝」要清潔、誠實、勤勉、規律、禮儀、奉仕、謙虛、正直。我一生不會欺騙人，就是受修身的影響。我是對就是對，不對也會承認不對。在日本，踩到別人的腳，向別人道歉，被踩到的人也會向你道歉，這樣哪會有爭執。日本人很重視「正直」，不會欺騙。記得當時日本老師要求正直，如果有人做錯而不承認，會害到全班接受處罰，後來就不會再有人做錯卻不認錯。

31 臺南・黃先生訪問稿。

每學年發新課本時，修身（教科書）都放在上面，最先分發，其次才是國語、算數、歷史、地理等等。因為受到修身、「正直」的影響，所以後來我從事農業，種田插秧也是很直。而且當時的日本老師，也都能本身作模範，站有站相、坐有坐樣，走路、精神也不一樣，哪裡像戰後，老師也會騙人，督學來查就教學生騙督學。「嘘つきは、泥棒の始まり」（說謊，是當小偷的開始）。做人的道理很重要，不能說的一種，做的又是一種。³²

高先生認為修身教育、特別是「正直」影響他很大，使他一生都不欺騙人，甚至連插秧也都很「正直」。他在比較戰前戰後的道德教育，對戰後的教育甚為鄙視、不以爲然，認為日本老師能以身作模範，但是戰後的老師很多卻是「說一套、做一套」，甚至教學生如何欺騙督學。

關於公學校教師，受訪者之一的烏日的林先生，本身於戰後也任教職，但是他也認為戰後的教師素質，特別在道德層面上完全無法與日治時期的教師相比。他認為：「師範、師範，老師就是要當模範，日本老師本身也確實都能當模範。」³³淡水另一位陳先生也認為戰前的修身教育會教你「しつけ」（教養、禮貌），老師也會以身作則，常常教導學生「人に迷惑をかけるな」（不要造成別人困擾），但是戰後有關「しつけ」教育則很缺乏，老師多不能作模範，不能達到「身教」。³⁴前述臺南的黃先生也談到：「公學校老師真不錯，很認真在教學，沒有敷衍，以身作則，很敬業，真是爲人師表。說到這個真是感嘆！日本老師不是混飯吃的，也不是拿補習費的，哪像我女兒說，她學校只有3個老師沒有補習，其他的都有替

32 淡水・高先生(1928年生)訪問稿(筆者2004.12.26訪談)。高先生，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務農。

33 烏日・林先生(1932年生)訪問稿(筆者2004.12.11訪談)。林先生，大學畢業，曾任國小、國中、高中教師。

34 淡水・陳先生(1935年生)訪問稿(筆者2005.2.2訪談)。陳先生，博士學位，大學教授。

學生補習。老師很重要，會影響小孩子一生。」³⁵

受訪者對於日治時期教育、修身教育，似乎呈現「一面倒」讚賞的趨勢，或許也跟當時的教師素質以及能否以身作模範有關。在這一次進行的問卷調查中，有對公學校教師印象評價之調查，其結果如表六：

表六：對公學校教師印象評價情形表

問 題	選項					合計	未填答
	甚佳	佳	普通	不佳	惡劣		
1. 對日本時代小學的老師 （含日本人教師、臺灣人教師）整體印象	104	82	12	1	0	199	4
	52.26%	41.21%	6.03%	0.50%	0%	100%	
2. 對日本人教師的印象	95	93	12	3	0	203	0
	47.74%	46.73%	6.03%	1.51%	0%	100%	
3. 對臺灣人教師的印象	55	86	39	1	0	181	23
	27.64%	43.22%	19.60%	0.50%	0%	100%	

N（受訪者）=203

從上表可知，如不分日本人或臺灣人教師，整體對小學教師的印象，「甚佳」者佔52.26%，「佳」者41.21%，合計高達94.47%的受訪者對於日治時代小學的教師有相當良好的評價，認為不佳者才只有1位。這麼高的數字，實在值得我們對所謂「殖民地教育」「皇民化教育」「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作另一番省思。還有，我們或許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對戰後的小學教師進行評價，會有什麼樣的數據或結果呈現？

35 臺南・黃先生訪問稿。

四、結論

以上是對日治時期修身教育與修身教科書作概括式的陳述後，再透過對曾經接受當時日式初等教育的老一輩臺灣人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與口述訪問，所得出的一些初步結果。在教科書的分析方面，第三期修身書的蒐集與分析，有待進一步去努力完成。此次問卷調查樣本數只有200份左右，口述訪談對象也僅10位上下，或許尚未能充分代表全部的傾向或呈顯出當時教育的樣態。但是它的結果所帶來的某些訊息，倒是值得向來的殖民教育研究者作些審思。

例如在「教育勅語」方面，戰爭結束60年後的今天，仍然有高達7成的受訪者大致記得或非常記得教育勅語，有人甚至仍能流利地背誦。而戰後學界對於教育勅語的批判，多著重在教育勅語與「軍國主義」「天皇制」或者所謂「忠君愛國」的國民精神涵養上面，但是在當時殖民地臺灣教育現場的這些七、八十歲臺灣人，他們的關注點卻不僅在於「忠君愛國」，他們更重視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的「五倫」、博愛、守法等等德行與公共社會倫理。很多問卷調查與口述訪談的受訪者，當他們可以從筆者處取得「教育勅語」的影本，顯得相當興奮。他們未必知道教育勅語在戰後被GHQ或美國教育使節團、甚至日本的學者定位為國家主義思想統制的工具。他們曾經必須費心思去背誦教育勅語，在「式典」中恭敬地聆聽校長奉讀，也在修身課裡接受尊敬的老師教誨勅語內容。他們也曾「忠君愛國」過，但是勅語中的儒家五倫與其他的德行，與修身教科書中的「正直」「誠實」「禮儀」「勤勉」「順從」「守法」「廉潔」「儉約」「良心」「敬師」「同情」「報恩」……等等德行一起，深深地烙印在他們的腦海中，影響他們一生的為人處世。在訪談中，他們雖然無法講出修身書中所列的諸多德行或人物，只能言拙地以「正直」「禮儀」「しつけ」等少數德行名詞來代替，但是這些象徵「ヨイコドモ」（好兒童）「よい国民」（好國民）的德行，已經足夠讓他們一生受用無窮。

在訪談中，受訪者也常拿戰後的教育情形、道德風氣、教師素質來作比較，也就是以戰後中國式的教育作為「對照組」。這個「對照組」、而且是飽受批判的「對照組」的存在，或許正是他們對於戰前日本教育、修身教育給予相對高評價的原因之一。³⁶

日本殖民時代的教育，尚有許多待研究的盲點存在。早期在未經深入調查研究下，即政治性的或便宜性的以「愚民教育」「奴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等污衊性字眼，來看待日治時期的教育。其實這一切都還有再進一步研究與釐清的空間。

* 問卷調查與口述訪談作業，感謝以下諸位同學的協助：

陳燕翎、坂井洋、鄭睦群、李嘉祥、高健和、江俊銓、康詩瑀、陳盛賢

36 在問卷調查中，有對於「日本時代的小學教育和戰後中國式的小學教育作比較」的問題，結果是203份問卷中，除6份未填答，150位(76.14%)認為日本教育較好，19位認為一樣好，24位認為無法比較，只有4位(2.03%)認為中國教育比較好。

引用書目

片山清一編

1974 《資料・教育勅語——渙發時および関連諸資料》。東京：高陵社書店。

白柳弘幸

2003 〈台南・安平墓地の墓誌と公学校修身書教材〉，收於日本植民地教育史研究会運営委員会，《植民地教育の残痕—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報 第6号》。東京：皓星社。

台湾教育会編

1939 《台湾教育沿革誌》。東京：青史社，複刻本，1982。

台湾總督府学務部

1914 《台湾公學校教科書編纂趣意書 第一編》。台北：台灣總督府。

台灣總督府

1919 《公学校修身書 卷五 卷六 編纂趣意書》。台北：台灣總督府。

周婉窈

2001 〈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臺灣史研究》8(2)：1-63。

2003 《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河添惠子

2004 《台湾新潮流》。東京：双風舎。

許佩賢

1994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張榕庭

2005 〈戰後臺灣民族精神教育之研究(1951-1996)〉，淡江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蔡錦堂

1999 〈日本統治初期台灣公學校「修身」教科書の一考察〉，收入大濱徹也編，《近代日本の歴史的位相——國家・民族・文化》，東京：刀水書房，頁299-311。

2007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收於《師大臺灣史學報》1：51-88。

歐用生

1981 〈日本統治下における台灣公學校教科書の研究——修身科教科書を中心として〉，《アジア文化》6號。

E. Patricia Tsurumi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lletin of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NTNU No2, pp.3-32, March 2009

The edu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ko-gakko shushin-education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

Chin-Tang Tsai

Abstract

The main topic 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Taiwanese ko-gakko shushin-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influence upon the Taiwanese children. We cannot completely collect the shushin textbooks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 especially those which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WWII since 1942. This article will not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shushin textbook content. We do the questionnaire and oral interview which attempt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condition of shushin education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 and the elder Taiwanese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ko-gakko education in Japanese Ruled Period. In the 203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s focus on the likes about the shushin subjects, the subject which has the greatest effect on daily knowledge, the memory about the Japanese National anthem and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the characters and the impression to those characters in the shushin textbooks. In the end, we deeply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naires and responses which are from the oral interview towards the elder people who received the Japa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ko-gakko, shushin, text book, shushin education, Imperial Rescript on Education, questionnaire, oral interview.